

丁玲文集  
第五卷

# 丁玲文集

## 第五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长沙

# 丁玲文集

第五卷

责任编辑：张翅翔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99,000 印张：14.625 印数：1—24,100

统一书号：10109·1608 定价：(平装)1.70元(精装)2.65元

## 出版说明

丁玲同志是当代我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以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为我国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出版她的文集，不仅可以满足广大读者阅读欣赏的需要，而且便于文学工作者研究她的创作成果和创作经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这套文集收作者自一九二七至一九八二间的文学作品及文学论著，包括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作、剧作、散文、文学论文。分卷出版。

这些作品在收入文集时作了仔细的校勘。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12.

## 目 录

鲁迅先生逝世唁函	1
开会之于鲁迅	1
鲁迅先生于我	3
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	22
彭德怀速写	25
马烽	27
忆天山	31
杨伍城	
——我的第二个“小鬼”	35
风雨中忆萧红	40
田保霖	
——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	45
民间艺人李卜	53
袁广发	
——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	61
吊“四八”殉难诸同志	70

我们永远在一起 .....	72
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 .....	77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	82
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人们	
——关于陈沫的记载 .....	113
噩耗传来 .....	120
战士史沫特莱生平 .....	123
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	
——怀念史沫特莱同志 .....	132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 .....	142
也频与革命 .....	165
胡也频 .....	169
悼雪峰 .....	179
悼念刘芝明同志 .....	184
一块闪烁的真金	
——忆柯仲平同志 .....	189
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 .....	193
我母亲的生平 .....	199
元帅呵，我想念您！ .....	213
悼念茅盾同志 .....	218

回忆潘汉年同志	222
回忆宣侠父烈士	229
悼江丰	243
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	249
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	253
一点补正	260
致《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编者信	261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262
易俗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	284
我的自传	292
自述	295
我的自白	297
幽居小简	303
我怎样来陕北的	305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	312
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	317
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329
初到密山	
——摘自回忆录中的一节	334

“牛棚”小品(三章) .....	344
附：三访汤原(陈明) .....	357
我的创作生活.....	379
我的创作经验.....	383
给《大陆新闻》编者的信 .....	386
一点经验.....	389
谈自己的创作.....	394
我的生平与创作.....	406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 .....	414
关于《杜晚香》 .....	422
《“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 ——在“《十月》文学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430
答《开卷》记者问 .....	434
解答三个问题.....	446

## 开会之于鲁迅

人在感觉到不能说出自己的感情的时候，是愿意沉默的。我对于鲁迅先生的忆念便是如此。

很多人都抒写了他们对鲁迅先生的赞仰和爱，我是高兴的。从这之中我的感情常为一种说不清楚的愉悦而悸动，我体会到那个活在我心中的人，他是如何深入到别人的感情中。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写出一篇能帮助人了解鲁迅先生思想的文章，也就是要在我多多了解鲁迅先生之后来写，但现在却只能写一点关于鲁迅先生生平中的点滴。

记得那时我在左联，我们都是很爱他的，我们总不愿拿些噜噜苏苏的事去麻烦他，不愿随便占用他的时间，所以每当举行什么会议的时候，如果我们之中有谁说，“找不找老头子来呢？”我们总是考虑了一下，常不去找他。如果不是在会前，也必然在会后去告诉他一些情况，他也总给我们一些意见。有什么事必须要他办的，他从不推辞就办了。这时之所以不常找他开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感到我们的会议中，实在有许多琐琐碎碎的什么工作计划喽，工作检查喽，我们不愿意拿这些经常的琐事麻烦他；那时我们在上海要开一个人数较多的会，实在不容易布置。但有些必要的会，那些我们认为最好有鲁迅先生参加的会，他总是到会的。虽说我们常

常担心他不能按时到会，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睡得很迟的，但他从不迟到。在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很平和地，精神集中地听着。有时有些青年作家们常常爱发表一些大套的理论，仿佛这就是最重要的，最新的意见，语气当中又是那么含着教训人的意味，说什么“你们这些老作家们……”，就是当这种时候，我也从没有看见鲁迅先生的任何一个表情上有什么不耐烦或不快。鲁迅先生在这些会议上说话是不多的，他总是听着，他也没有反驳过谁，说谁是大错特错，也没有批评过谁，说谁是“左”倾右倾。尽管有些人的意见是幼稚得可笑，但鲁迅先生结果总是说：“我们要做起来，我们要一点一点做起来，我们就照着这些意见切实地做吧！”开过了会，我们常常感到对他有些抱歉似的，对他说些种种难处，承认我们准备得不好，又解释着某某虽还幼稚，却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等等。鲁迅先生总是毫不介意地笑笑，接着他就同我们谈起那些应该如何具体去着手的工作了。

的确有些人怕开会，尤其是比较有些文化、理论的人，怕去参加比他程度低、了解慢的群众的会。因为这种会上必然有许多幼稚的意见，有许多需要再三再四重复解释的问题，这常常会使人不耐烦。但鲁迅先生却从没有蔑视这种会议，蔑视别人的意见，他总是耐心倾听着，他抓着一点说几句简要的话，他执行着。到现在我回想起那时的我们，我们的发言，真是多么幼稚啊！鲁迅先生却从没有摆出一副指导者的架子，用教训的口吻来说话，他把他的被领导者看成同等的人，而且是以恪守规则的样子来出现的。

一九四〇年八月

## 鲁迅先生于我

我开始接触新文学，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到长沙周南女校以后。这以前我读的是四书，古文，作文用文言。因为我不喜欢当时书肆上出售的那些作文范本，不喜欢抄书，我的作文经常只能得八十分左右。即使老校长常在我的作文后边写很长的批语，为同学们所羡慕，但我对作文仍是没有多大兴趣。我在课外倒是读了不少小说，是所谓“闲书”的。大人们自己也喜欢看，就是不准我们看。我母亲则是不禁止，也不提倡，她只要我能把功课做好就成。自然，谁也没有把这些“闲书”视为文学，谁也不认为它有一点什么用处。

周南女校这时有些新风。我们班的教员陈启明先生是比较进步的一个，他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常常把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画上红圈，把《新青年》、《新潮》介绍给同学们看。他讲新思想，讲新文学。我为他所讲的那些反封建，把现存的封建伦理道德翻个格的言论所鼓动。我喜欢寻找那些“造反有理”的言论。施存统先生的《非孝论》的观点给我印象很

深。我对我出身的那个大家庭深感厌恶，觉得他们虚伪，无耻，专横，跋扈，腐朽，堕落，势利。因此，我喜欢看一些带政治性的，讲问题的文艺作品。但因为我年龄小，学识有限，另一些比较浅显的作品，诗、顺口溜才容易为我喜欢。那时我曾当作儿歌背诵，至今还能记忆的有：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  
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

俞平伯、康白情的诗也是我们喜欢背的。后来人一天天长大，接触面多了，便又有了新的选择。一九二一年，湖南有了文化书社。我从那里买到一本郭沫若的诗集《女神》，读后真是爱不释手。我整天价背诵“一的一切，一切的一”，或者就是：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我，还有我中学的同学们，至少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幼小的心是飘浮的，是动荡的。我们什么都接受，什么都似懂非懂，什么都使我们感动。我们一会儿放歌，一会儿低吟，一会儿兴高采烈，慷慨激昂，一会儿愁深似海，仿佛自个儿身体载负不起自己的哀思。我那时读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可是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时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古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甚至唱本《再生缘》、《再造天》，或还读不太懂的骈体文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正传》更能迷住我。因此那时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义的郭沫若，闺秀作家谢冰心，乃至包天笑，周瘦鹃。而林琴南给我印象更深，他介绍了那末多的外国小说给我们，如《茶花女》、《曼郎摄氏戈》、《三剑客》、《钟楼怪人》、《悲惨世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想在阅世不深，对社会缺乏深刻了解的时候，可能都会是这样的。

一九二二、二三年我在上海时期，仍只对都德的《最后一课》有所感受，觉得这同一般小说不同，联系到自己的国家民族，促人猛省。我还读到其它一些亡国之后的国家的一些作品，如波兰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我也读了文学研究会耿济之翻译的一些俄国小说。我那时偏于喜欢厚重的作品，对托尔斯泰的《活尸》、《复活》等，都能有所领会。这些作品便日复一日地来在我眼下，塞满我的脑子，使我原来追

求革命应有所行动的热情，慢慢转到了对文学的欣赏。我开始觉得文学不只是消遣的，而是对人有启发的。我好象悟到一些问题，但仍是理解不深，还是朦朦胧胧，好象一张吸墨纸，把各种颜色的墨水都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

一九二四年我来到北京。我的最好的、思想一致的挚友王剑虹在上海病逝了。她的际遇刺痛了我。我虽然有了许多新朋友，但都不能代替她。我毫无兴味地学着数理化，希望考上大学，回过头来当一个正式的学生。我又寂寞地学习绘画，希望美术能使我翻滚的心得到平静。我常常感到这个世界是不好的，可是想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前进。可是向哪里前进呢？上海，我不想回去了；北京，我还挤不进去；于是我又读书，这时是一颗比较深沉的心了。我重新读一些读过的东西，感受也不同了，“鲁迅”成了两个特大的字，在我心头闪烁。我寻找过去被我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我从那里认识真正的中国，多么不幸，多么痛苦，多么黑暗！啊，原来我身上压得那样沉重的就是整个多难的祖国，可悲的我的同胞呵！我读这些书是得不到快乐的。我总感到呼吸迫促，心里象堵着一堆什么，然而却又感到有所慰藉。鲁迅，他怎能这么体贴人情，细致、尖锐、深刻地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解剖得这样清楚，令人凄凉，却又使人罢手不得。难道我们中华儿女能无视这个有毒的社会来侵袭人，迫害人，吞吃人吗？鲁迅，真是一个非凡的人吧！我这样想。我如饥似渴地寻找他的小说、杂文，翻旧杂志，买刚出版的新书，一篇也不愿漏掉在《京报副刊》、《语丝》上登载的他的文章，我总想多读到一些，多知道一些，他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

## 二

一九二五年三月间，我从香山搬到西城辟才胡同同一间公寓里。我报考美术学校没有考上，便到一个画家办的私人画室里每天素描瓶瓶罐罐、维娜斯的半身石膏像和老头像。开始还有左恭同志，两个人一道；几次以后，他不去了，只我一个人。这个画家姓甚名谁，我早忘了；只记得他家是北方普通的四合院，南屋三间打通成一大间，布置成一个画室，摆六、七个画架，陈设着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瓶瓶罐罐，还有五六个人半身或全身的石膏人像，还有瓶花，这都是为学生准备的。学生不多，在不同的时间来。我去过十几次，只有三四次碰到有人。学生每月交两元学费，自带纸笔。他的学生最多不过十来个，大约每月可收入二十来元。我看得出他的情绪不高，他总是默默地看着我画，有时连看也不看，随便指点几句，有时赞赏我几句，以鼓励我继续学下去。我老是独自对着冰冷的石膏像，我太寂寞了。我努力锻炼意志，想象各种理由，说服自己，但我没有能坚持下去。这成了我一生中有时要后悔的事，如果当初我真的能成为一个画家，我的生活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比我后来几十年的曲折坎坷可能要稍好一点；但这都是多余的话了。

这时，有一个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学生教我法文，劝我去法国。他叫我“伯弟”，大概是小的意思。他说只要筹划二百元旅费，到巴黎以后，他能帮助我找到职业。我同意了，可是朋友们都不赞成，她们说这个人的历史、人品，大家都

不清楚，跟着他去，前途渺茫，万一沦落异邦，不懂语言，又不识别的人，实在危险。我母亲一向都是赞助我的，这次也不同意。我是不愿使母亲忧郁的，便放弃了远行的幻想。为了寻找职业，我从报纸上的广告栏内，看到一个在香港等地经商的人征求秘书，工资虽然只有二十元，却可以免费去上海、广州、香港。我又心动了。可是朋友们更加反对，说这可能是一个骗子，甚至是一个人贩子。我还不相信，世界就果真象朋友们说的那样，什么地方都满生荆棘，遍设陷阱，我只能有在友情的怀抱中进大学这一条路吗？不，我想去试一试。我自许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怎么会轻易为一个骗子，或者是一个人贩子所出卖呢？可是母亲来信了，不同意我去当这个秘书，认为这是无益的冒险，我自然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我怎么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生呢？难道我能靠母亲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吗？我实在苦闷极了！在苦闷中，我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我应该朝着这唯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盏飘忽的小灯走过去，我应该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着我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会向我伸出手的。于是我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细细坦白详尽地陈述了一番，这就是《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记的“得丁玲信”。信发出之后，我日夜盼望着，每天早晚都向公寓的那位看门老人问：“有我的信吗？”但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两个星期之后，我焦急不堪，以至绝望了。这时王剑虹的父亲王勃山老先生邀我和他一路回湖南。

他是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会来到北京的，现在准备回去。他说东北军正在进关，如不快走，怕以后不好走，南北是否会打仗也说不定。在北京我本来无事可做，没有入学，那个私人画室也不去了。唯一能系留我的只是鲁迅先生的一封回信，然而这给我失望和苦恼。我还住在北京干什么呢？归去来兮，胡不归？母亲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我了，正为我一会儿要去法国，一会儿要当秘书而很不放心呢。那末，我随他归去吧，他是王剑虹的父亲，也等于是我的父亲，就随他归去吧。这样我离开了春天的北京，正是繁花似锦的时候。我跟随王勃山老人搭上南下的军车，是吴佩孚的军队南撤，火车站不卖客车票，许多人，包括我们都抢上车，挤得坐无坐处，站无站处。我一直懊恼地想：“干吗我要凑这个热闹？干吗我要找这个苦吃？我有什么急事要回湖南？对于北京，住了快一年的北京，是不是就这样告别了？我前进的道路就是这样地被赶着，被挤在这闷塞的车厢里吗？我不等鲁迅的回信，那末我还有什么指望得到一个光明的前途呢？”

鲁迅就是没有给我回信。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更真切地感到我是被这世界遗弃了的。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渺小的人，鲁迅原可以不理我；也许我的信写得不好，令人讨厌，他可以回别人的信，就是不理睬我。他对别人都是热情的，伸出援助之手的，就认为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对我就要无情。我的心受伤了，但这不怪鲁迅，很可能只怪我自己。后来，胡也频告诉我，我离北京后不久，他去看过鲁迅。原来他和荆有麟、项拙三个人在《京报》编辑《民众文艺周刊》，曾去过鲁迅家，见过两三次面。这一天，他又去看鲁迅，递